

皖南事变发生和新四军失败原因再论

曹天生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对新四军进行的一次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围剿,是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对于这样一个震惊中外的事变,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迭出不穷,但我们认为,如果要把皖南事变的研究引向深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即皖南事变发生和新四军失败的军事经济背景应当充分得到重视。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①这就是说,军事和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和社会变迁的前导,它本原的东西是经济。申而论之,皖南事变作为又一次反共高潮的顶点,其终极的原因也同样可以,而且应当到当时的“经济学中去寻找”。众所周知,战争起源于经济,又依赖于经济,战争双方各种力量的较量,归根到底是经济实力的较量,经济实力包括人力、物力与财力。就经济实力中的人力而言,它是转化为军力的构成要素,人与武器装备相结合,就形成战斗力。因此,战争首先需要动员和消耗的就是人力资源。列宁曾经说过:“谁的后备多,谁的人力多,谁的人民群众有更大的耐力,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②这是古往今来军事上的普遍规律。从经济实力中的物力和财力来说,战争对经济的依赖,表现为战争必然引起一些特殊的社会需要,既有用以补充对军事人员的需要,又有用以补充对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的需要,因此,战争的较量,必须形成军用物资生产和保障的较量。特别是武器装备的较量,又特别是先进武器、先进装备的较量。综观皖南事变发生和新四军失败的前后过程,仅从历史的经济学即经济史,特别是军事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事变的发生和新四军在皖南事变战斗中的失败就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历史必然性。

首先,皖南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优越,决定了蒋介石不可能让新四军军部久驻皖南。皖南地处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腹地,到1940年时,华中抗日根据地处于江、淮、河、汉之间,东临大海,西屏武当,南起浙赣,北至陇海,包括江苏的绝大部分,安徽、湖北的大部分,河南、浙江的一部分,湖南的一小部分,总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人口6千余万。这一地区物产丰富,交通发达,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而且更在经济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个地区,对于日寇来说,它是掠夺我国人力、物力、财力的主要地区所在,也是连接华北、华南的枢纽和实施南进计划的后方基地之一;这个地区对国民党反动派来说,它是自1927年后10多年统治的最基本地区,也是它在华北失败后与我党我军拼死争夺的主要地区;这个地区对我党我军来说,是继华北之后进一步开展敌后抗战、建立抗日民主根据

地、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地区。新四军进入到华中，特别是军部驻扎到皖南，对我党我军是十分有利的。我军在这一地区的抗日活动，一可以在敌后破坏敌人的经济，粉碎敌人“以战养战”的罪恶阴谋；二可以在敌后打击敌人，不断扩大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三可以在敌后充分利用有利的人力、物力条件，扩大武装，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发展战时经济，解决物资困难和部队供给；四可以在同敌人的战斗中多得缴获，以武装自己。南方八省游击队自组建新四军以来，深入华中敌后，队伍不断扩大，创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并发展到了苏北，到1940年，部队人数已发展到9万余众。新四军之所以能在这一地区立足和发展，除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合法因素、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指挥外，其重要因素是华中地区经济资源和人力、物力、财力条件较全国其它地区优越，特别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的皖江地区，它处于日寇在华中的心脏地带，扼制着长江下游咽喉和淮南路两侧，迫近南京、芜湖。皖江地区的经济条件更为优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而且水陆交通便利发达，有良好的税收来源，所以，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一方面，有利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另一方面，有利于指挥所属各部展开行动，保证新四军这个神经中枢既能屈，又能伸，退可进山，进可以向平原地区发展，游刃有余。正因为华中地区特别是皖江地区这么重要，所以，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告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皓电”，诬蔑我军不遵编制数目而自由扩充。并将国民党“中央提尔案”以最后决定的形式通知我军，限令我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这实际上就是要将新四军以合法名义挤出华中这块人力资源充足、经济条件富裕、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将新四军军部挤出退可以进山，进可以向平原发展的地区，使新四军在羽毛尚未完全丰满之时，到黄河以北与敌之重兵作战，以假日本人之手，大量消耗我军。同时，夺取我党我军经过浴血奋战而建立起来的黄河以南及长江流域的抗日根据地。所以，皖南既处日寇侵华沦陷区的心脏地带，又是国民党与我军争夺以谋它图的重要地区之一，因此，蒋介石不可能让新四军军部这个全军的神经中枢久居皖南。

其次，蒋介石处心积虑，从军事经济上限制新四军的发展，为第二次反共高潮打下伏笔。我们知道，新四军成立后，国民党当局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新四军的破坏和压迫。在新四军成立初期，他对新四军的主要政策是妄图通过政治上的拉拢腐蚀和军事上的限制、压迫，软硬兼施瓦解和搞垮新四军，但由于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坚持革命立场，坚持听从中共中央的指示，同国民党的反革命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实现。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对新四军经济上的限制更为严重了，这种限制的实质一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攘外必先安内”的特殊表现形式之一；二是为了造成蒋蒋军与我军在军事经济实力上的更大差距。蒋介石等在这方面的手段是很高明的，这里仅择几例：

——控制新四军自我发展。新四军自成立后，在编制上、经费上一直受到蒋介石的控制。如1939年11月间，叶挺在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了新四军的情况，要求增加经费，给新编的两个支队以正式编制，蒋介石竭力拉拢叶挺，说如果他参加了国民党，经费、编制都好解决，结果，叶挺向他提交了第二个辞呈。此后，在编制问题上新四军一直未获很好解决。非但如此，国民党还于1940年7月16日提出了一个所谓“中央提尔案”，其中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到达国民党指定地区内后，不得在原驻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不得变更名义，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等。我们知道，不准八路军、新四军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就是不让新四军通过自我筹措、接受外援、发动群众的方式去补充兵员，补充一切军用物资尤其是武器弹药。这种只要新四军抗日，不要新四军发展的做法就是害怕革命力量的壮大而成为自己日后强劲对手的表现。

——克扣新四军的军需供给。及至1940年，新四军发展到9万之众，但却以12321人的编制发放，我方据理力争，每月军响才由86000元增加到132000元，还不到蒋介石嫡系部队一个师的军响。至于对军粮、军械和弹药的克扣更甚。统监部发放我军供给不是每月一次发完，而是故意分几次发放，使我汽车运输队多次往返，有时领到一次供给还不足抵偿油耗^③。

——破坏皖南工合运动，阻止新四军发展军事经济。自1938年8月起，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等人的支持下，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兴起，其目的是帮助中国抗日。1939年4月，中国工合浙皖办事处在皖南山城屯溪成立，这个办事处的工作给新四军以很大帮助，新四军也派干部参加工作。到1939年10月，浙皖办事处为更好地直接支援新四军的抗日战争，在新四军军部附近的茂林镇设立了“经太事务所”，所内绝大部分人员为新四军干部和中共党员、党的积极分子。经太事务所与新四军在新四军军部附近地区续办和新办起了几十个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生产的绝大多数是军需物资，基本上满足了新四军的需要，同时还解决了当地人民和部分流亡难民的生活，一方面打破了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的重重经济封锁，一方面加强了在抗战年代党与革命军队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仅如此，中国工合还将海外捐赠的大批物资和款项赠给新四军作抗日之用，在工合后期达到工合收入总数的三分之一^④。为了破坏工合运动特别是皖南工合与新四军的亲密合作关系，皖南的国民党顽固派加强了对浙皖办事处的控制。1940年11月初国民党突然停止对经太事务所的贷款，并由国民党接任领导，许多人因不满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愤而辞职，皖南工合从此名存实亡，皖南事变后，在工合的工作人员和部分社员遭到了国民党的逮捕、毒打，物资被一抢而光。

——皖南事变前停发新四军军费和枪弹。国民党政府为了限共，从而灭共，破坏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从1940年10月起就停发了八路军军费，而新四军的军费从1940年9月起即行停发。但新四军北移是一次战略大行动，需要一大批经费和物资^⑤，停止发放军费和枪弹，妄图使新四军在抗战中消耗实力而得不到有效补充。1940年11月11日，即“佳电”发表后的第二天，叶挺按照党中央的电报指示，专程前往江西上饶三战区总部，找顾祝同商谈北撤事宜，叶挺要求发放开拔费用、伤亡抚恤费用；补充枪支弹药以及应领的粮食及医药器材，叶挺得到的答复是，军费要呈军政部核批，粮食与器材可就北撤路上分批领取，枪弹一项则需视库存情况，并在第一批部队越过日军防线后才能酌量给予补给^⑥。几天以后（1940年11月中旬），在蒋介石、顾祝同的阴谋策划下，上官云相约叶挺到宣城的周王村会晤，叶挺再一次向上官云相提出提前发给三个月经费、枪弹、医药器材等以便早日开始行动。会晤后，上官云相对下级布置说：“军需室为新四军催请经费，粮秣可请发至1940年底，以后发给代金要他们自行就地购买，可是，经费必须尽快催请发给，好显出我们是真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的，至于枪弹、电料、医药器材等，也就不必费事去请发了。”^⑦这最后一句“不必费事去请发”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其部下也想必心领神会其司马昭之心。又据时任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的回忆：“在此期间，新四军曾两度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来上饶，要求确定渡江路线并尽快补给粮弹器材，以便早日完成渡江准备……，从顾的批语来看，他对粮食器材考虑不多，大体如数批准，独对弹药十分审慎，甚至再三斟酌，每次都略有削减……，只是在事变前不久，袁国平同志第二次来上饶催发时，顾祝同才批给了少量的弹药，这大概一方面由于无可推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麻痹新四军吧。”^⑧1940年12月13日，顾祝同急召叶挺到上饶，宣布蒋介石命新四军改道北移的新电令，与顾会谈间，叶挺又提出发给枪弹和25万元经费，但顾祝同只给了2万元。也就是说，国民党发出皓电后，新四军只得到国民党2万元经费。从经费来说，这是杯水车薪，

从枪弹来说,则是一毛不拔。

再次,蒋介石增强国民党军事经济实力的各个方面,造成我军在皖南事变中惨败的不可避免。蒋介石在发动皖南事变前,一方面限制新四军的发展,从人力、物力、财力诸多方面百般限制;另一方面,却大大增强国民党军的人力、物力、财力供给,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以围剿新四军,在这方面亦可谓是用心良苦。

在人力上,根据岳星明的回忆,在1940年10月以前新四军在皖南地区万余人的部队,除了正面抗击芜湖、繁昌一带的日寇外,三面均已受到蒋军共四个师的防范、监视。计右有东北军的108师,后有“中央军”的52师,左有川军144师和145师;蒋军兵力已不下4万之众。1940年10月下旬,唯恐兵力不够,又增调了川军146师、浙东79师和海州40师、浙东62师、第九战区19师,同时,先后将23集团军和32集团军总部调往皖南^⑨,使国民党军以10万之众的绝对人力优势来对付新四军。

在物力上,蒋介石十分注意把装备精良的部队调集皖南,如40师,原是由海州税警总团改编的,配有德国造卜福式的山炮,这在当时是十分精良的武器之一,顾祝同并将40师用在第一线与新四军作战。蒋军的另外几个师虽然与40师相比较有些差别,但都比新四军的装备好,尤其是国民党军队配有山炮,这就大大加强了作战威力。同时,蒋介石、顾祝同为做好事变前的充分准备,还于1940年12月中旬赶修了重庆至上饶之间的长途载波电话,为蒋、顾随时密谋又创造了条件。为了搞好围剿新四军的战斗物资补充,顾祝同、上官云相特令“三十二分监部于宁国设前线指挥所,并积存必要的粮弹,以便补给。”^⑩在财力上,蒋、顾1940年9月份前发给蒋军的经费,1个师超过新四军的整个军。9月份后,蒋、顾对各参战部队经费又予加拨,从财力上再一次保证了皖南事变围剿新四军的成功。

综观以上三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由于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蒋介石由其反共反人民的本性所驱使,无论从军事战略上,还是经济战略上都不允许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久留,这就导致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不可避免,即使新四军军部提前开拔不发生皖南事变,也会发生针对新四军的其他类似事件。因为经济的因素是根本,而苏北的战役(黄桥战役、曹甸战役)只是催化剂而已。由于第二、第三两方面的原因,蒋介石等控制新四军的发展,从军事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这就造成了新四军军事经济实力上与蒋介石军队军事经济的相对差距;而从经济上加强蒋介石军队的各个方面,是为了造成新四军军事经济实力上与蒋介石军队的绝对差距。而相对差距与绝对差距的绝对值越大,就越有利于蒋对新四军的“解决”。皖南事变的事实证明,新四军在1:10兵员的绝对劣势下,在武器装备的绝对劣势下伤亡惨重。在战斗中,除了军事战斗中决策和指挥上不可避免的失误外,许多情况是因弹尽粮绝而损兵折将的。完全可以相信,在皖南事变突围中,如果装备精良,新四军完全可以大量减少伤亡。总之,我们研究皖南事变发生和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无论是从其深度上还是从其广度上都应该从军事经济的角度加以深入的考察。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7页。②《列宁全集》第30卷,第55页。③叶进明、忻元锡:《新四军军属兵站始末》,载《新四军办事机构概览》,第319页。④路易·艾黎:《“工合”运动记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107页。⑤⑦陈枫著:《皖南事变始末》,第100页,第77页。⑥参见段雨生、赵酬、李杞华著:《叶挺将军传》,第369页。⑧⑨岳星明:《顾祝同的反共军事阴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第7—8页,第4—5页。⑩武之荣:《上官云相袭击新四军的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第19页。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石立民]